

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影视书写与新闻建构

战迪¹,李凯山²

(1.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渐涉深水,跨国交流日益频繁,公民出境执行公务、经商、留学和旅游的数量逐年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也不断加剧。从媒介再现理论出发,跨越并打通影视作品和视听新闻报道之间的观念区隔,在比较分析路径下深入反思作为特殊媒介现象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是怎样被视听传媒捕捉、记录与传播的,研究认为,利用外交资源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既是对“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等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以人为本”、“以侨为本”外交宗旨的立体再现。能否处理好突发性海外公民安全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发达与否的重要尺度。

关键词:海外安全;出国安全问题;影视;电视新闻;中国公民;媒介再现

中图分类号:G 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5-0005-05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渐涉深水,跨国交流日益频繁,公民出境执行公务、经商、留学和旅游的数量逐年增加。自2000年我国内地居民出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以来,这一数字以18.5%的速度持续增长,截至2016年底,“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22亿人次,比2015年的1.17亿人次增长4.3%,继续蝉联全球出境旅游人次世界冠军。”^[1]然而,与海外交流繁荣同时出现的则是我国公民在境外遭受的包括人身、财产在内的合法权益侵害的各类风险隐患。

2010年,8名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遇人质劫持丧生。2012年,载有5名中国人的尼泊尔飞机坠毁。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一名中国公民遇难。2013年,一艘载有18名中国船员的巴拿马籍货轮在韩国沉没。2013年,巴厘岛车祸中四名中国游客丧生。2014年,莫斯科列车脱轨事故中2名中国人遇难。2014年,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154

名中国乘客全部遇难。2015年,马里酒店遇袭,3名中国公民遇难。2017年,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达被绑架。2017年,中国派驻美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失踪,后被证实遇害……分析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公民在海外经由外交部受理的领事保护案件超过3万起^[2]。我国出境人员中万人受领事保护案件的比例甚至高于发达国家^[3]。这一状况已引起我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门的足够重视,并成为近年来外交工作的新重点。

早在2015年出席“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时,外交部部长王毅就着重强调,“中国外交将竭诚为同胞福祉尽责,全力为中国公民及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与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4]当下,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不仅是外交工作的新重点,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新课题,也在多元学科的交叉互渗中不断被打量与思考。电影电视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关于海外公民安全问题的信息传播、宣传报道、安全教育、思想诠释

收稿日期:2017-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17BZW166)

作者简介:战迪,文学博士,传播学博士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李凯山,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研究。

等方面从未缺失,并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本研究试图从媒介再现理论出发,跨越并打通虚构传播的影视作品和纪实传播的视听新闻报道之间的观念区隔,在比较分析路径下深入反思作为特殊媒介现象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是如何被视听传媒捕捉、记录与传播的。这些以公民海外安全为主题或亚主题的媒介文本最终传递了哪些价值判断,给观众带来了怎样的引导,又传播了什么样的国家意志甚至国家形象。同时,当下这些视听媒介文本又反映出哪些不容规避的行政缺失亟待改进。

二、公民海外安全的媒介再现

近年来,在国人经济条件日趋向好,政府出国政策不断放开,特别是视听媒介大力推介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基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原因,频繁的海外交流成为了可能,特别是出国旅游已经成为了部分国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出国安全问题也不断见诸媒体,“公民海外安全”的议题被不断提及,并在公众视野中保持着相当的热度。

传播学者葛洛斯(Larry Gross)早前曾提出,“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实质是在创造或生产另一个象征真实;并且,媒体的再现赋予各种群体不同的可见性和权力,或者说,媒体中的再现即是一种权力。”^[5]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媒研究专家莎妮·奥嘉德(ShaniOrgad)在其《媒介再现与全球想象》一书中也以其跨文化视野分析和阐释了大众传播媒介如何通过影像、文字和声音将观众引入另一番游离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并与之建立起“亲密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媒介再现和表征,人们在不断地校对、修正关于自己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概言之,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就是传播媒介对事件的呈现创造了人们对其关注对象的崭新观念、意义及其结果。在符号选择和建构的过程中,不仅文化主体通过传播内容的策划来生产新的意义,观众也在头脑中构建自己的概念认知。

不难想见,近年来,无论是追求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的虚构类传播媒介电影,还是追求细节真实的纪实类传播媒介电视新闻,在关于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问题上,大众传播媒介都赋予了其显在或潜在的可见性,并隐含着多重意见导向。在电影领域,《人在囧途》等“囧”系列IP生产中主人公在泰国、香港等地不仅因民族、文化等原因身陷困境,也因为地域

不安全因素的存在而遭遇危机;改编自鲍晶晶同名小说的《等风来》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尼泊尔寻找幸福的旅程中麻烦不断,甚至遭遇当地暴乱,死里逃生的故事;《战狼1》《战狼2》更是在战争、动作、犯罪、“超级英雄”等类型片融合的创作实践中把故事矛盾、冲突的发生地选择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以反恐、撤侨为主题彰显了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形象。事实上,近年来,类似的电影创作不在少数,而作为这些影片的共同亚主题,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在视听新闻传播领域,海外公民安全问题的相关报道也不断引发民众热议。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国际新闻频道为例,2010年以来,此类报道占据着国际新闻中的较高比例。从报道形式来看,相关报道经历了新闻短讯、新闻特写、系列报道、连续报道和深度报道几种类型的更迭。由此可见,海外公民安全问题的新闻呈现日趋向纵深方向发展,并扭结为一股强大的舆论洪流。仅以2013年“6名中国留学生法国遇袭”为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以系列报道的形式连续播出,并打通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多条通道,全方位、立体化对该事件进行了介入性调查报道,最终在中国驻法领馆的协同下,完整展现了该事件的始末,并提出了指导性的安全建议。

在对比影视媒介与新闻媒介关于出国安全问题的呈现时,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虚构与纪实、典型与常态等媒介特性方面的区别外,两类媒介在思想旨趣方面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前者通过对不同种类的海外安全问题发生时巧合、矛盾、冲突、悬念等叙事形态的展示,多描摹出化险为夷的快慰感,除暗示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外,还有意将海外历险进行了崇高化处理,从而令观影者对海外生活、海外历险心生向往。相反,后者则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多或少对海外生活进行了污名化处理,给观众的海外印象造成一定的阴影。

总体而言,无论是影视媒介还是新闻媒介,都通过自己特有的价值判断来再现意识形态,以塑造想象社区的方式来构建关于海外生活的认知共同体,媒介再现将虚拟与现实世界整合在一起,不仅无远弗届,更虚实相生。“在媒介再现过程中,传播者通过媒介的可视性获得利益和权利,观众通过‘有距离的媒介接触’的新形式可以与相隔遥远的人以及事件形成联系。”^[6]

三、海外安全事件的成因、类型与处置方略:基于国内主流视听新闻媒介的报道分析

从早期的目的地治安恶化、旅行盗抢频发,到劳务人员权益受损,乃至今天的劫持人质、暴力犯罪,中国公民在海外所遭遇的安全问题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冲突的概率和烈度也不断升级。笔者以国内主流视听新闻媒介 2010.01—2017.08 关于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 302 条相关报道为样本,进行了案例分析,试图梳理总结出海外公民安全隐患的具体成因与基本类型。

(一)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的成因分析

首先,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公民经商、度假、探亲、留学访问的人数逐年递增,地理范围不断扩大,遇到风险的几率自然相应提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出国安全问题是发展中的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难以规避的现象。

第二,当今世界地区间不稳定因素种类繁多。治安状况、社会局势、安全形势、恐怖袭击、武装冲突等不确定因素仍旧存在。这些都严重威胁着海外公民的切身安全。

第三,国际自然物质资源分派不平衡,国际合作中的利益诉求分歧巨大,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余震至今仍未消除。这些都为海外从事商业活动的公民带来潜在危机。

此外,突发性自然灾害、不可抗拒性事故时有发生,海外公民与华侨间缺乏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族凝聚力,公民因出国教育不足,缺乏领事证件常识,不了解目的地国政治、文化、宗教习俗和惯例也导致安全问题增加。

(二)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的基本类型

通过盘点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案例可以发现,公民海外安全事故集中体现为如下几种类型:人身意外伤害、恐袭战乱、自然灾害、通讯诈骗、遭遇抢劫等。依据对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危机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如下三大类型:第一类是直接威胁生命安全的,包括目的地国治安状况严峻、政局动荡造成的突发性区域战争、恐怖主义猖獗、重特大交通事故(海难、空难、车祸等);第二类尽管没有严重威胁生命,但对个人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集中体现为中国公民在海

外遭受不公正待遇所造成的损失。如当地警察执法不当、车辆船只被扣等;第三类是部分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此类情况的发生多由于中国公民在出行前对目的地国的政策法律学习和了解不足造成的。包括因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出入境受阻、目的地国的劳务纠纷和留学纠纷等。

(三)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处置方略

报道显示,针对近年来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多发的状况,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预防、应对、处置等方面的努力。这其中既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和驻外使领馆三位一体的制度化保障体系、事前预防、事后及时协调应对、事后妥善处理并总结经验的机制化建设,也包括以法制化的手段切实为海外中国公民维权。

就现实情况来看,海外安全问题的加剧对领事保护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央视专题报道《“三道防线”守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工作纪实》就详实地记录了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近年来的具体工作。面对镜头,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汤恒坦言:“面对不断扩大的领保需求与有限的领保资源、领保案件常态化与领保人员缺乏、公众期望值与领保工作局限性三重供需矛盾,总领馆按照既定方针,将领保工作关口前移,主动构筑起守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的三道防线。”^[7]通过事前提醒预警、预防性领保宣传、升级领保网络三道防线,总领馆为海外公民撑起来一把“越来越牢固的保护伞”。

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前,中国政府在公民海外维权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而中国政府的处置能力也考验着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外交能力。这种外交能力作为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展现出当前变革中的中国所应有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

仅从目前实况来看,虽然变化可喜,但仍有诸多不足之处有待提高。学者夏丽萍指出:“对于国家来说,除了加强海外领事保护外,还应加强有关立法工作。如加强外派劳务方面的立法,使国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有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保护各国外派劳工的国际公约、协定、原则或规范。国际劳工组织分别于 1949 年和 1975 年通过的《移民就业公约(第 79 号公约)》和《移工人建议书(第 151 号建议书)》,也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公约批准国家有义务采取行动,在社会保障方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准国民待遇。至于具体的保障、救

护等事项,两个公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8]。尽管从国际范围来看,海外公民权益保障方面仍存在漏洞和缺陷,但中国政府能否率先垂范,在国际合作框架下加强法规建设,有效应对不同类型和级别的海外公民安全纠纷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迫切。

四、影视书写与新闻建构:保护海外公民安全,展示大国担当,彰显国家形象

海外中国公民的权益保护问题由来已久。中国人侨居海外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千年前。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政府积贫积弱,作为“化外之人”、“二等公民”的海外华人饱受歧视和压迫。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大面积扩张殖民地,数百万国人以“契约华工”“贩卖人口”的形式被输送到东南亚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解放前,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逾4300万^[9]。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横行无忌,而海外华人却被视为“弃民”,得不到任何权益的保障。1740年,万名华人在印尼惨遭屠杀;1870年,同样是在印尼,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红溪惨案”。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清政府竟宣称:“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10]

事实上,我国媒体关于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的关注历史并不久远。这与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文本梳理考察发现,西方新闻媒介也鲜有对中国公民安全问题的系统关注。然而,西方电影创作领域对海外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却有着十分丰富的影像展演历史。在对现有资料的整理中不难发现,西方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长期以来塑造的中国海外公民形象呈现出显著的负面色彩:19世纪末,是落后愚昧腐朽的中国形象;20世纪初,是在贫困边缘挣扎的“未开化”的中国形象;文革前后是“政治奇观化和文化妖魔化”的中国形象。此外,西方电影还着力塑造了一些家喻户晓的刻板人物形象:“黄祸论”的产物——邪恶的傅满洲、缺乏阳刚之气的“小丑”侦探陈查理、阴柔奇异的东方女性。中国形象在西方人认知中的负面化和妖魔化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长期误读关系密切,而这种误读又往往与某些电影塑造的中国形象不谋而合,两者呈现出相互支撑的同构色彩。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被漠视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得到

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主席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所倡导的“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归国的华侨”政策终于落地。1949年新政协通过并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外国华侨的正当权益和利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不仅在思想上高度关注华人华侨的权益,并在国际法框架内积极斡旋、协调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世界范围内“排华”“反华”的现实问题也因为中国政府的逐渐强大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可以想见,保护海外公民安全,既能够展示大国担当,又彰显出强大的国家形象。2011年,湄公河船只遇袭事件发生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及相关报道引发了外媒的关注。美国《洛杉矶时报》认为,在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保护海外公民安全不但是—种国家形象,更容易获得民意,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如电影《湄公河行动》中所描述的那样,面对复杂的外交关系、棘手的现实处境和犯罪团伙的打击报复,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同志亲赴现场,与老挝、缅甸、泰国三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孟建柱表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不容侵害,中国政府不仅要为遇害船员伸冤、严惩涉案凶犯,还要为所有公民提供更有力的海外安全保障。”^[11]在多国执法力量的协助下,中国公安部门成功破获湄公河大案,为维护湄公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该地区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更彰显了中国强大的国家形象。

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新闻传播的视野中,利用外交资源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既是对“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等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以人为本”、“以侨为本”外交宗旨的立体再现。能否处理好突发性海外公民安全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发达与否的重要尺度。

五、余论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报道显示,在中国大国地位日趋稳固的背景下,海外公民在安全事故中多得到了必要的赔偿,如2017年美国新泽西菲尔莱狄更斯大学中国留学生王玮琪车祸身亡,家属就获赔90万美元。研究资料表明,目前电影、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中所传播的海外安全问题多为烈度较大、影响较

广泛的一类,这与外交部所披露的涉及领事保护的公民由于自身防范意识不够等主观原因造成的交通安全事故等相去甚远。因此,海外安全的防范也需要公民自身强大的安全防范意识。此外,海外公民所遭遇到的安全危害数量和比例并不高于国内出行的安全危害,因此民众也不必在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下过分紧张。从政府行政层面来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许多成熟的领事保护经验和海外安全防范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 小乔. 出境游人数 2016 年再增 4.3% 发展潜力依旧巨大 [EB/OL]. 前瞻网. <http://d.qianzhan.com/xnews/detail/541/170207-ae336d40.html>. 2017-02-07.
- [2] 外交部. 2006 年我国公民出境人数达 3200 万人次 [EB/OL]. 新华网: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61231/13852348.html. 2006-12-31.
- [3] 汪段泳. 中国海外公民安全: 基于对外交部“出国特别提醒”(2008-2010) 的量化解读[J]. 外交评论, 2011, (1): 61.
- [4] 黄日涵. 保护海外公民安全, 展现大国责任 [EB/OL]. 光明网. http://theory.gmw.cn/2015-12/31/content_18317702.htm. 2015-12-31.
- [5] Jennifer Harding. Sex Act: Practices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M]. 林秀丽译. 台北: 韦伯出版社, 2000. 59-61.
- [6] 陈敏菁. 关于媒介再现的启示——读《媒介再现与全球想象》[J]. 青年记者, 2014, (8): 22.
- [7] 周喆. 通讯“三道防线”守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工作纪实 [E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6/22/c_1119093370.htm.
- [8] 夏丽萍. 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状况分析 [J]. 国际论坛, 2006, (1): 45.
- [9] 任贵祥.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 [M]. 北京: 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9. 66.
- [10] 韩永福. 清代前期的华侨政策与红溪惨案 [J]. 历史档案, 1992, (4): 102.
- [11] 孟建柱. 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不容侵害 [EB/OL]. 央视网.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713/101795.shtml>.

【责任编辑: 周琍】

The Security Issue of Chinese Nationals Overseas Reflected in Films and News Reports

ZHAN Di¹, LI Kai-shan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Media & Cultur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2. Normal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With deepening of China's opening up and reform,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going abroad for official duties, business, study and travel keeps climbing year by year. Meanwhile,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nationals overseas is becoming a more serious issue. Based on media representation theory, breaking the concept barrier between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news reports, this research,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probes into how the security issue of Chinese nationals overseas as a special media phenomenon is captured, recorded and propagated by AV (audio-visual) media. The research shows utilizing diplomatic resources to safeguard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nationals is a vivid interpretation of such ideas as “governing for the people” and “diplomacy for the people”,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putting Chinese nationals overseas first”. To some degree, whether unexpected security incidents can be properly handle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a country's power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overseas security; Security issues abroad;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TV news; Chinese nationals; media representation